

最高檢察署

檢察官言詞辯論意旨書  
(110 年度台上字第 3445 號)

檢察官 林永義  
陳瑞仁  
蔡秋明  
林俊言  
李進榮  
吳巡龍



## 最高法院提出之法律問題

- 一、 兩公約的解釋，除依兩公約施行法第 3 條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ttee)之解釋之外，是否包括其他？
- 二、 依兩公約及相關解釋，精神障礙是否不得判處死刑？若是，有無限定於何種精神障礙？理由為何？
- 三、 人權事務委員會 2018 年第 124 屆會議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第 49 點前段：「締約國應避免對於面臨特殊障礙難以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自我辯護的個人，如存在嚴重社會心理和心智障礙而阻礙其進行有效辯護的個人，以及道德可非難性有限的個人判處死刑。」其意義及適用範圍為何？
- 四、 原判決論上訴人觸犯刑法第 173 條第 3 項、第 1 項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未遂罪、第 271 條第 1 項殺人計 9 罪，同條第 2 項、第 1 項殺人未遂計 5 罪，其認事用法，是否有違法或不當之處？
- 五、 原判決量處上訴人死刑，量刑部分有無違法或不當之處？

## 目錄

壹、兩公約的解釋，除依兩公約施行法第 3 條規定，應參照其立法 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ttee)之解釋之 外，是否包括其他？.....	1
一、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之法規範.....	1
二、以條約為基礎之法規範.....	4
三、相關公約規定及有權機關之解釋對我國有內國法之拘束力	5
四、我國自辦國家人權報告審查程序之專家小組結論意見書 ..	7
貳、依兩公約及相關解釋，精神障礙是否不得判處死刑？若是，有 無限定於何種精神障礙？理由為何？.....	8
一、精神障礙不得判處死刑屬於量刑問題.....	8
二、依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精神障礙不得判處死刑.....	11
三、精神障礙者不得判處死刑僅限於「嚴重社會心理和心智障 礙」.....	13
參、人權事務委員會 2018 年第 124 屆會議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第 49 點前段之意義及適用範圍.....	15
一、精神障礙不得判處死刑之原因.....	15
二、美國法.....	17
(一)死刑判決之要件.....	17
(二)精神障礙對死刑之影響.....	22
三、日本法.....	25
(一)審判時陷於心神喪失狀態，得為不受理判決.....	25
(二)審判時於實體面主張行為時處於心神喪失狀態.....	27
(三)判處死刑後陷於心神喪失狀態，得免除刑之執行....	30
四、本署意見.....	31
肆、原判決論上訴人觸犯刑法第 173 條第 3 項、第 1 項之放火燒燬 現供人使用住宅未遂罪，第 271 條第 1 項殺人計 9 罪，同條第 2 項、第 1 項殺人未遂計 5 罪，其認事用法是否有違法或不當之處?34	

一、偵查程序未指派通譯，並未違反公政公約規定.....	34
二、本件並無「累積因果關係」.....	34
三、被告對於本案被害人死亡結果具有客觀歸責.....	35
四、被告對於陳永華、胡進福具有殺人之確定故意，對其餘被害人具有殺人之未必故意.....	36
五、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	37
伍、原判決量處上訴人死刑，量刑部分有無違法或不當之處? ...	38
一、量處死刑應審酌事項.....	38
二、僅具未必故意之犯罪亦可能屬「情節重大之罪」.....	39
三、原判決量刑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	40

被告 李國輝

為被告家暴殺人等案件，謹就最高法院整理之辯論爭點依序陳述意見如下：

**壹、兩公約的解釋，除依兩公約施行法第3條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ttee)之解釋之外，是否包括其他？**

聯合國所屬機關及兩公約監督執行機關對國際人權法之解釋有時不完全一致，且對我國拘束力不同，因此需先解釋國際組織機關、條約機關與兩公約之關係，才能瞭解當該等機關解釋意見產生差異時，我國應如何依循。

全球性之國際人權保護系統可分為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之法規範及以條約為基礎之法規範二類，前者例如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之世界人權宣言，後者例如兩公約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分述如下：

**一、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之法規範**

聯合國憲章第 62 條規定：「一、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以下簡稱「經社理事會」)得作成或發動關於國際經濟、社會、文化、教育、衛生、及其他有關事項之研究及報告；並得向大會、聯合國會員國、及關係專門機關，提出關於此種事項之建議案。二、本理事會為增進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及維護起見，得作成建議案。」經社理事會乃以作成決議方式交給聯合國大會來履行該任務。經社理事會於 1946 年 2 月 16 日以決

議設立下級機關「人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負責向經社理事會提出建議與報告<sup>1</sup>。聯合國大會於 2006 年廢除「人權委員會」，成立「人權理事會」(Human Rights Council)，隸屬於聯合國大會，有權審查國家持續性之重大人權侵害行為。

聯合國經社理事會 1984 / 50 號決議通過「保障死刑犯人權保證條款」(Safeguards Guaranteeing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ose Facing the Death Penalty)，其中第 3 段規定：「於犯罪時未滿十八歲之人不應科處死刑，對於孕婦、或剛生產之產婦，或心神喪失者(persons who have become insane)，不得執行死刑。<sup>2</sup>」該決議屬於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之國際組織機關之引導，對成員國並無拘束力<sup>3</sup>，對非聯合國會員之我國更無拘束力，且與後述之兩公約無關。我國部分法院判決<sup>4</sup>誤以為經社理事會決議公布之「保障死刑犯人權保證條款」屬於對公政公約有權機關之權威解釋，應出於誤解。

然而，經社理事會 1984 / 50 號決議之相似內容後來為人權委員會 2005 / 59 號決議採用，人權委員會 2005 / 59 號決議第 7 段表示：「敦促所有仍維持死刑之國家(a)不對在犯罪時未滿 18 歲者科處死刑。(b)排除孕婦與有依賴其哺育之產婦於死刑之外。(c)不對於任何心神障礙者或智能障礙者(mental 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科處死刑或執行死刑。<sup>5</sup>」此決議屬於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之規範，且嗣後被國際

1 陳怡凱，國際人權法在我國法院之適用—以精神障礙者是否可科處死刑為例，憲政時代，40 卷 3 期，2015 年 1 月，311 頁以下，325-326 頁。

2 E. S. C. Res. 1984/50 (May 25, 1984), "3. Persons below 18 years of age at the time of the commission of the crime shall not be sentenced to death, nor shall the death sentence be carried out on pregnant women, or on new mothers, or on persons who have become insane."

3 廖福特，「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國內法化之影響：最高法院死刑相關判決之檢視，臺大法學論叢，43 卷特刊，2014 年 11 月，911 頁以下，925-926 頁。

4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度原侵上重更三字第 1 號判決認為：「兩公約規定已具國內法效力，而關於死刑裁量在實體法上之適用，首應參照公政公約第 6 條第 2 項前段：『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之規定。又該規定所謂『情節最重大之罪』，其內涵並非毫無界線，最有力之解釋莫過於西元 1984 年 5 月 25 日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決議批准公布之『保障死刑犯人權保證條款』，其第 1 條對此解釋係指『蓄意且造成致命或極嚴重之後果的犯罪』。該判決經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940 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940 號判決亦有類似情形。

5 U.N. Doc. E/CN.4/RES/2005/59, (The Ques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April 20, 2005),

組織機關實務所接受，對聯合國之會員國形成法拘束力。因國際法並無執行機關，各成員國是否完全接受、遵守及落實程度則屬別一問題<sup>6</sup>。

我國並非聯合國會員，人權委員會 2005 / 59 號決議對我國並無法拘束力，亦與後述之兩公約無關，但仍俱參考價值；若我國認為該決議所決定之法則後來經由實踐已達國際慣例程度，才有法拘束力。然而，最高法院部分判決(例如 [102 年度台上字第 4289 號](#) 判決)將「人權委員會」2005 / 59 號決議誤植為公政公約之監督機關「人權事務委員會」之決議，並因此誤認為對我國有拘束力。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3062 號](#) 判決對此即指出：「兩公約施行法第三條係規定：『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而『公政公約』係於一九六六年經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於一九七六年生效，上開『人權事務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ttee)，係依『公政公約』第二十八條規定所設置，負責公政公約之監督與執行。另『人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則係經社理事會依聯合國憲章於一九四六年決議設立；是『人權委員會』與『人權事務委員會』不同。又『經社文公約』之監督及執行機構，原為經社理事會，但經社理事會於一九八五年決議另外設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 (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下稱『經社文委員會』) 來負責。而上開 2005/59 決議係於『經社文委員會』成立後『人權委員會』所為之解釋，並非上開二委員會所為，上訴意旨以『人權委員會』上開 2005/59 決議第七項為『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云云，為不足採。」[103 年度台上字第 3062 號](#) 判決此部

---

“ 7. Urges all States that still maintain the death penalty:

(a) Not to impose it for crimes committed by persons below 18 years of age;

(b) To exclude pregnant women and mothers with dependent infants from capital punishment;

(c) Not to impose the death penalty on a person suffering from any mental 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or to execute any such person;”.

<sup>6</sup> 陳怡凱，國際人權法在我國法院之適用—以精障者是否可科處死刑為例，憲政時代，40 卷 3 期，2015 年 1 月，311 頁以下，331-337 頁。



分論述，應屬確論。

## 二、以條約為基礎之法規範

世界人權宣言及兩公約雖皆由人權委員會起草，但世界人權宣言係經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兩公約則是交給各國簽署。詳言之，聯合國大會於 1966 年通過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以下稱「公政公約」) 草案提供給各國批准，根據「公政公約」第 49 條第 1 項，該條約於累積至第 35 件批准書送交聯合國秘書長存放之日起 3 個月後生效，公政公約依此於 1976 年生效。因「公政公約」之國際法源不是聯合國大會決議，而是國際法院規約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第 38 條第 1 項(a)款之條約，所以其效力只拘束締約國。

公政公約依該公約第 28 條設立「人權事務委員會」(Human Rights Committee)，監督締約國履行公約義務。人權事務委員會是以條約創設之獨立機關，並非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之機關。人權事務委員會對於該公約條文，可以議決「一般性意見」加以解釋；人權事務委員會並有權審查締約國國家人權報告書(state report)並發表結論意見建議書，有權審查國家申訴(inter-state communication)、個人申訴(individual communication)案件並作成申訴決定。實際上人權事務委員會未曾審查過任何國家申訴案件，因此目前人權事務委員會的解釋意見只有三種：一般意見、審查締約國國家報告的解釋意見、審理締約國個人申訴的決定<sup>7</sup>。因為人權事務委員會對公政公約之解釋屬於有權機關之解釋，我國法院適用公政公約條文時，應遵守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意見。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

<sup>7</sup> 廖福特，「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國內法化之影響：最高法院死刑相關判決之檢視，臺大法學論叢，43 卷特刊，2014 年 11 月，911 頁以下，916 頁。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以下稱「經社文公約」)亦是國際人權條約，但其監督機關是聯合國經社理事會(ECOSOC,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而非條約自創機關。經社理事會並於1985年以決議創設下屬機關「經社文權利委員會」(Committee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負責監督經社文公約之執行<sup>8</sup>。目前經社文公約唯一監督機制是國家報告制度，經社文權利委員會除對經社文公約之解釋公布一般意見外，有權審查締約國提交之國家報告並發表結論意見建議書。

多邊條約之生效過程包括：簽署、批准、將批准書送交指定處所存放，送交存放處所將收到批准書一事發函通知其他締約國，才發生加入條約之效力。公政公約與經社文公約在我國合稱「兩公約」，由於我國於2009年5月14日批准公政公約及經社文公約，送交存放之兩公約批准書被聯合國秘書長退件，並未完成條約加入程序，因此兩公約對我國並未產生國際法之拘束力<sup>9</sup>。

### 三、相關公約規定及有權機關之解釋對我國有內國法之拘束力

我國立法院於2009年3月31日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以下稱「兩公約施行法」)，並於2009年12月10日施行。兩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第3條規定：「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因此上開公約、立法意旨及兩公約監督機關對公約之解釋，均具有國內法之拘束力，法院不僅應適用兩公約條文，亦應適用兩公約監督機關之解釋意見。

「兩公約施行法」第3條所稱之「公政公約」立法意旨，應係指

---

<sup>8</sup> 陳怡凱，國際人權法在我國法院之適用—以精障者是否可科處死刑為例，憲政時代，40卷3期，2015年1月，311頁以下，332頁。

<sup>9</sup> 廖福特，批准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及制定施行法之評論，月旦法學雜誌，174期，2009年11月，225頁。

兩公約共同之前言，其內容主要強調人性尊嚴、呼籲實踐聯合國憲章之人權條款及世界人權宣言<sup>10</sup>。兩公約施行法第3條所稱「國際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應指公政公約之監督執行機關「人權事務委員會」及經社文公約之監督執行機關「經社文權利委員會」。雖然經社理事會依經社文公約第16條規定也是監督機關，不過經社理事會已經將經社文公約監督執行任務及審查國家報告書任務交給經社文權利委員會，因此經社文權利委員會對於經社文公約之決議(包括一般意見與國家報告書之結論意見)才對締約國有拘束力。經社理事會、人權委員會、人權理事會均非兩公約施行法第3條所規定之「人權事務委員會」，其決議並非基於兩公約之授權，對我國並無法拘束力<sup>11</sup>。

另外，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亦屬於以條約為基礎之法規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條第2項規定：「身心障礙者包括肢體、精神、智力或感官長期損傷者，其損傷與各種障礙相互作用，可能阻礙身心障礙者與他人於平等基礎上充分有效參與社會。」公約第10條規定對身心障礙者生命權之保障，第15條第2項之規定：「締約國應採取所有有效之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防止身心障礙者遭受酷刑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

我國於103年8月20日由總統公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並自103年12月3日施行，該施行法第2條規定：「公約所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第3條規定：「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所以我國亦因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之制定、施行，將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內國法化，該公約立法意旨及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委員會對該公約之解釋，對我國同有拘

---

<sup>10</sup> 廖福特，「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國內法化之影響：最高法院死刑相關判決之檢視，臺大法學論叢，43卷特刊，2014年11月，911頁以下，916頁。

<sup>11</sup> 陳怡凱，國際人權法在我國法院之適用—以精障者是否可科處死刑為例，憲政時代，40卷3期，2015年1月，311頁以下，337、348頁。

束力。

#### 四、我國自辦國家人權報告審查程序之專家小組結論意見書

無論是公政公約或經社文公約，均有國家報告制度，以公政公約為例，公政公約第 40 條規定締約國應採取措施去實現公約所承認之權利，並對於其進展提出報告書。締約國因此每 5 年提出一次國家人權報告書，交由人權事務委員會審查。是否符合公政公約規定之人權標準係由人權事務委員會審查判定，而非各國國內法院自行決定。

我國因為兩公約批准書被聯合國秘書長退件，未能有效加入兩公約，但兩公約施行法第 6 條規定：「政府應依兩公約規定，建立人權報告制度。」因此我國自辦國家人權報告之依據並非兩公約，而是屬於內國法之兩公約施行法；我國邀請國際人權專家所為之結論意見不等同於人權事務委員會之結論意見，屬於依內國法建立之外部控制機制，對我國不生國際法拘束力。就內國法規範而言，我國自辦國家人權報告審查程序之專家小組結論意見書應有高度參考價值，但該意見畢竟不是立法機關所通過之法律，其意見與人權事務委員會意見相同者，法院於適用兩公約時，應受拘束；逾越此範圍，固然可以作為解釋兩公約之法源基礎，法院仍應依據法律獨立審判。

2013 年我國自辦的國際人權專家審查我國國家人權報告書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57 點表示：「直到完全廢除死刑之前，中華民國（臺灣）政府應確保所有與判處及執行死刑相關的程序與實質保護措施被謹慎的遵守。特別是心理或智能障礙者(persons with mental 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不得被判處死刑和/或執行死刑。<sup>12</sup>」此意見與後述人權事務委員會 2018 年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第 49

---

<sup>12</sup> 國際獨立專家通過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

<https://www.humanrights.moj.gov.tw/media/12490/312259531585.pdf?mediaDL=true>, "Until the

點前段之用語並不完全一致(詳後述)。

我國於 2017 年辦理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國際審查，國際獨立專家在結論性意見 35 點表示：「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廢除死刑，在尚未廢除死刑前，法務部應於審核死刑案件執行實施要點中明確規定，以確保社會心理/心智障礙者(persons with psychosocial and/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不致蒙受死刑。<sup>13</sup>」此意見與後述人權事務委員會 2018 年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第 49 點前段之用語亦不一致，涵括範圍是否相同乃生爭議。

**貳、依兩公約及相關解釋，精神障礙是否不得判處死刑？若是，有無限定於何種精神障礙？理由為何？**

### **一、精神障礙不得判處死刑屬於量刑問題**

精神障礙不得判處死刑此一議題經常與刑事責任能力或受審能力產生混淆，聯合國秘書長於 2010 年提交社經理事會的定期報告即解釋：「(精神障礙者判處死刑)此議題經常和其他相關但不同的問題混淆，例如行為人於犯罪行為時有無責任能力、心神喪失抗辯，或就審時有無受審能力等問題。所謂不得對精神障礙者執行死刑，亦適用於行為時或審判時精神狀況正常，然於被判處死刑後陷於精神障礙之情形……<sup>14</sup>」。

---

final abolition of capital punishment,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should ensure that all relevant procedural and substantive safeguards relating to the imposition and execution of capital punishment are scrupulously adhered to. In particular, persons with mental 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shall never be sentenced to death and/or executed.”(2021 年 10 月 14 日參閱)。

<sup>13</sup> [https://crpd.sfaa.gov.tw/BulletinCtrl?func=getBulletin&p=b\\_2&c=D&bulletinId=261](https://crpd.sfaa.gov.tw/BulletinCtrl?func=getBulletin&p=b_2&c=D&bulletinId=261) “35.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abolish the death penalty, and until such time that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establishes clear provisions in the Guidelines for Execution of Death Penalty Cases, ensure that death penalties are not enforced for persons with psychosocial and/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2021 年 10 月 21 日參閱)。

<sup>14</sup> U.N. Doc. E2010/10, para 91, “ This issue is often confused with the related but different questions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rime itself and application of an insanity defence, and of fitness to stand trial, where a person is un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trial for mental health reasons. The norm protecting insane and mentally disabled persons from execution applies even when there is no question of competency at the time the crime was committed or at trial. It is not uncommon for a person to become insane subsequent to conviction and sentence of death, and in such cases execution is forbidden by the third safeguard.”

「精神障礙者不得判處或執行死刑」此一法則非限於「犯罪行為時」欠缺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之行為人，只要能證明行為人審判時精神障礙達一定程度，縱使行為時其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均正常，仍有該法則之適用。然而，有論者發現我國部分法院判決亦將公政公約精神障礙不得判處死刑解釋意見錯誤解讀為僅指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態，並誤認為只要被告不符合刑法第 19 條規定，即可宣告死刑<sup>15</sup>。

就刑事責任能力方面，各國都承認行為人精神障礙對刑事責任能力之影響，我國刑法第 19 條規定：「（第 1 項）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第 2 項）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第 3 項）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亦即，行為人於犯罪行為時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辨識能力，與依其辨識而控制行為之控制能力，二者若其中之一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而完全欠缺，即欠缺責任能力；若有顯著減低，則因減輕責任能力而影響其量刑。判斷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須以行為人「行為時」之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是否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影響來認定。系爭臺灣高等法院 [109 年度上重更二字第 5 號](#) 判決事實認定：（被告）「本案行為時，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亦無顯著減低之情形」。亦即，依被告「行為時」之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判斷，仍有完全刑事責任。此部分事實既經事實審確定並詳述理由（原審判決書第 16 至 22 頁），在本案亦未將之列為爭點，本言詞辯論意旨書茲不贅論。

就受審能力方面，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1 項規定：「被告心神喪失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該條項所謂之「心神喪失」，原是刑法第 19 條刑事責任能力之判斷標準，而受審能力應依被告「審

---

<sup>15</sup> 請詳參王正嘉，論死刑之裁量與界限：以兩公約與比較法為出發，臺大法學論叢，45 卷 2 期，2016 年 6 月，687 頁以下，719 頁。

判時得否有效行使防禦權」來判斷，因此二者之判斷標準邏輯上應有所區別。最高法院 [88 年度台上字第 5414 號](#) 等判決即表示：「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被告心神喪失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係為保護被告利益，使被告得依其自由之意思行使其防禦權而設。」

以我國經常參考之美國法為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Dusky v. U. S.* 案<sup>16</sup>表示：被告有無受審能力應考量兩個標準，(1)有無足夠之理性與理解能力與律師諮詢；(2)能否理解訴訟進行的內容。若被告因精神障礙導致欠缺上開二項能力之一，即受審能力不足，審判應暫停，並將被告強制住院接受治療，否則即侵害被告受正當法律程序審判權。依美國聯邦法 18 U.S. Code § 4244 規定<sup>17</sup>，若有罪判決後量刑前被告

---

16 362 U.S. 402 (1960), "test must be whether he has sufficient present ability to consult with his lawyer with a reasonable degree of rational understanding -- and whether he has a rational as well as factu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edings against him."

17 18 U.S. Code § 4244 - Hospitalization of a convicted person suffering from mental disease or defect

(a) Motion To Determine Present Mental Condition of Convicted Defendant.—

A defendant found guilty of an offense, or the attorney for the Government, may, within ten days after the defendant is found guilty, and prior to the time the defendant is sentenced, file a motion for a hearing on the present mental condition of the defendant if the motion is supported by substantial information indicating that the defendant may presently be suffering from a mental disease or defect for the treatment of which he is in need of custody for care or treatment in a suitable facility. The court shall grant the motion, or at any time prior to the sentencing of the defendant shall order such a hearing on its own motion, if it is of the opinion that there is reasonable cause to believe that the defendant may presently be suffering from a mental disease or defect for the treatment of which he is in need of custody for care or treatment in a suitable facility.

(b) Psychiatric or Psychological Examination and Report.—

Prior to the date of the hearing, the court may order that a psychiatric or psyc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the defendant be conducted, and that a psychiatric or psychological report be filed with the court, pursuant to the provisions of section 4247(b) and (c)...

(c)...

(d) Determination and Disposition.—

If, after the hearing, the court finds 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that the defendant is presently suffering from a mental disease or defect and that he should, in lieu of being sentenced to imprisonment, be committed to a suitable facility for care or treatment, the court shall commit the defendant to the custody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

(e) Discharge.—

When the director of the facility in which the defendant is hospitalized pursuant to subsection (d) determines that the defendant has recovered from his mental disease or defect to such an extent that he is no longer in need of custody for care or treatment in such a facility, he shall promptly file a certificate to that effect with the clerk of the court that ordered the commitment. The clerk shall send a copy of the certificate to the defendant's counsel and to the attorney for the Government. If, at the time of the filing of the certificate, the provisional sentence imposed pursuant to subsection (d) has not expired, the court shall proceed finally to sentencing and may modify the



主張有精神疾病、精神障礙事由，應由被告於有罪判決後 10 日內向法院提出住院治療聲請，法院認為有合理事由時應舉行聽審，聽審前法院得命被告接受精神或心理檢測，法院以優勢證據（過半證據）門檻決定應否將被告送精神疾病醫院處所治療，於被告治療完畢後再進行量刑程序。我國法院解釋刑事訴訟法第 294 條第 1 項規定之「心神喪失」時，是乎可參考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之前開標準。

本案被告受審能力在本案並未列為爭點，且原審判決書第 19 頁認定：「被告於訊問時之法庭活動表現，觀諸被告各次於偵審筆錄之內容，可知被告於偵審中對於案發前後之行為順序、蘇福盛、陳永華、胡進福等人激怒其情緒之原因等犯罪之刺激及動機，暨其放火之細節，均能陳述明確且記憶清晰。其於原審審理過程中，針對敵性證人蘇福盛、陳永華所述，被告均能表示該等證人所述不實，而針對其他證人盧建宇、黃秀嬌、李群輝、蘇博文、吳秀鳳等人，則表示沒意見（見原審卷二第 26、28 至 30 頁），於本院上訴審審理時亦能針對證人蘇福盛之證述明確表達意見（見 107 年度上重訴字第 24 號卷二第 100 頁），是被告對於外在事理判斷及辨識之能力均屬正常。」本署認為本案被告具備受審能力，因此本言詞辯論意旨書亦不贅論被告受審能力，避免議題失焦，先此說明。

## 二、依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精神障礙不得判處死刑

公政公約第 6 條第 1 項、第 5 項規定：「(1)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5)未滿 18 歲之人不得判處死刑，懷胎婦女不得被執行死刑。」第 7 條前段規定：「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是公政公約條文禁止判處死刑之對象僅限於對於未滿 18 歲之人及懷胎婦女，對於「精神障礙」是否不得判處或執行死



刑，並未作規定。

然而，公政公約之監督執行機關人權事務委員會對於此一議題數次表示精神障礙者不得判處死刑之意見。首先，人權事務委員會於1995年審查美國之國家人權報告書，在結論意見書第281點中表示：「很遺憾，美國在某些案子中，欠缺使心神障礙者(mentally retarded)免於被科處死刑之保護。<sup>18</sup>」

其次，在 R. S. v. Trinidad and Tobago (R .S .v. 千里達與托巴哥) 個人申訴案，R .S . 為千里達公民，犯殺人罪，於各級法院均被判處死刑而確定。申訴人於1996年3月8日被宣讀執行死刑之令狀，告知將於3月13日執行死刑。千里達政府於3月12日暫停死刑之執行，以便對於申訴人之精神狀態作完整地檢查。申訴人主張對於精神障礙者執行死刑之令狀違反公約第6條、第7條與第10條。人權事務委員會認為：「申訴人之律師所提供之資料顯示出：申訴人在死刑執行之令狀宣讀時處於心神不足狀態(mentally incompetent)，申訴人週遭之人與監獄當局是明顯知情的，此一資訊並未被國家當事人所爭執。在這種情況下，對申訴人執行死刑之令狀構成對公約第7條之違反。由於委員會沒有任何關於在訴訟早期階段申訴人之精神健康之資訊，所以委員會無法決定是否公約第6條之權利申訴人也受到侵害了。<sup>19</sup>」論者多認為人權事務委員會在此案等於

---

<sup>18</sup>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United States (1995), U.N. Doc. CCPR/C/79/Add. 50, para. 16. "It also regrets that, in some cases, there appears to have been lack of protection from the death penalty of those mentally retarded."

<sup>19</sup> Communication No. 684/1996, U.N. Doc. CCPR/C/74/D/684/1996 (2002), R. S. v. Trinidad and Tobago [7.2]. "As to the author's claim that issuing of a warrant for the execution of a mentally incompetent person constitutes a violation of articles 6 and 7 of the Covenant, the Committee notes that the author's counsel does not claim that his client was mentally incompetent at the time of impos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and his claim focuses on the time when the warrant for execution was issued. Counsel has provided information that shows that the author's mental state at the time of the reading of the death warrant was obvious to those around him and should have been apparent to the prison authorities. This information has not been contested by the State party. The Committee is of the opinion that in these circumstances issuing a warrant for the execution of the author constituted a violation of article 7 of the Covenant. As the Committee has no further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author's state of mental health at earlier stages of the proceedings, it is not in a position to decide whether the author's rights under article 6 were also violated."

表示「精神障礙者不得科處死刑」<sup>20</sup>。

因此，雖然公政公約沒有明文規定對於精神障礙者不得判處死刑，不過人權事務委員會於前述國家人權報告書中之結論意見以及個人申訴決定均指出：對於精神障礙者不得判處死刑。亦即，依人權事務委員會之權威解釋，公政公約第 6 條第 5 項規定不得科處及執行死刑之對象，已經從未滿 18 歲及孕婦擴張及於精神障礙之被告。人權事務委員會 2018 年第 124 屆會議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第 49 點前段(詳後述)則彙整上開意見並調整用語，並重申上開結論。

### 三、精神障礙者不得判處死刑僅限於「嚴重社會心理和心智障礙」

精神障礙之成因不一，有先天基因或成長遲緩造成，也有後天發生意外或染病引起，精神障礙在醫學分類上有神經外科(neurologist)、神經內科(psychiatrist)及身心科(psychologist)之區別。依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對被告為精神鑑定，本案被告則係因長期施用安非他命類物質引發精神疾病。

「精神障礙不得判處死刑」此一原則雖經人權事務委員會確認，且不限於何種類之精神障礙或成因，但國際人權法各項相關文件對此法則用語不一，範圍產生差異。其中聯合國經社理事會 1984 / 50 號決議第 3 段指「心神喪失者」(persons who have become insane)，人權委員會 2005 / 59 號第 7 段指「心神障礙者或智能障礙者」(mental 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2013 年國際人權專家審查我國國家人權報告書之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57 點指「心理或智能障礙者」(persons with mental 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我國 2017 年 CRPD 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 35 點用語「社會心理/心智障礙者」(persons with psychosocial and/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

<sup>20</sup> Sarah Joseph, Jenny Schultz & Melissa Castan,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Cases, Materials, and Commentary* 196 (3d ed., 2013);引自陳怡凱，國際人權法在我國法院之適用—以精障者是否可科處死刑為例，憲政時代，40 卷 3 期，2015 年 1 月，312 頁，351 頁。

人權事務委員會在 1995 年審查美國之國家人權報告書結論建議書第 281 點指「心神障礙者」(mentally retarded)，人權事務委員會在 R. S. v. Trinidad and Tobago 個人申訴案指「心神不足狀態」(mentally incompetent)。上開用語雖大同小異，但因文義不同，解釋之適用對象可能產生差異。幸好，人權事務委員會 2018 年第 124 屆會議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第 49 點前段已對此定調為「嚴重社會心理和心智障礙」(serious psycho-social and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上開各機關之解釋或意見，以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為唯一對公政公約有權機關之解釋，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意見及用詞雖於 1995 年審查美國之國家人權報告結論意見書及 1996 年審查 R. S. v. Trinidad and Tobago (R .S .v. 千里達與托巴哥) 個人申訴案前後不一致，因為人權事務委員會已經將其先前表示之意見修正彙整成 2018 年第 124 屆會議第 36 號第 49 點前段一般性意見，自應以人權事務委員會 2018 年第 124 屆會議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第 49 點前段之解釋最為權威，且依「兩公約施行法」第 3 條規定，對我國法院有法律拘束力。

至於上述 2013 年國際人權專家審查我國國家人權報告書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57 點表示：「直到完全廢除死刑之前，中華民國(臺灣)政府應確保所有與判處及執行死刑相關的程序與實質保護措施被謹慎的遵守。特別是心理或智能障礙者(persons with mental 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不得被判處死刑和/或執行死刑。」我國於 2017 年辦理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國際審查，國際獨立專家在結論性意見 35 點表示：「國際審查委員會建議國家廢除死刑，在尚未廢除死刑前，法務部應於審核死刑案件執行實施要點中明確規定，以確保社會心理/心智障礙者(persons with psychosocial and/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不致蒙受死刑。<sup>21</sup>」此二意見因與人權

---

<sup>21</sup> [https://crpd.sfaa.gov.tw/BulletinCtrl?func=getBulletin&p=b\\_2&c=D&bulletinId=261](https://crpd.sfaa.gov.tw/BulletinCtrl?func=getBulletin&p=b_2&c=D&bulletinId=261) “35. The IRC recommends that the State abolish the death penalty, and until such time that the Department of

事務委員會 2018 年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第 49 點前段文義未必一致，固然仍可以作為解釋公政公約之法源基礎，法院仍應依據法律獨立審判。

對此問題，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940 號](#) 判決表示：「人食五穀雜糧，不免有七情六欲，常有病痛發生，因遺傳因素及生長環境，每一個人個性不同，或斤斤計較，或大而化之，不論任何人，或多或少懷有幻想，帶有『神經質』（實為精神質），時有非份之想。既然每個人都有夢想、痴想，不能因稍有幻想即謂有精神疾病。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1 條第 2 項規定：身心障礙者，包括肢體、精神、智力或感官長期損傷者，其損傷與各種障礙相互作用，可能阻礙身心障礙者與他人於平等基礎上充分有效參與社會。據此，該公約所稱之身心障礙者，須以肢體、精神、智力或感官長期損傷，並可能阻礙與他人於平等基礎上充分有效參與社會，始足當之；一般人輕微身障而不影響與他人平等相處、共同有效參與社會，即不與之。」上開見解與本署分析途徑不同，但結論殊途同歸。

## 參、人權事務委員會 2018 年第 124 屆會議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第 49 點前段之意義及適用範圍

### 一、精神障礙不得判處死刑之原因

人權事務委員會 2018 年第 124 屆會議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第 49 點前段表示：「締約國應避免對於面臨特殊障礙難以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自我辯護的個人，如存在嚴重社會心理和心智障礙而阻礙其進行有效辯護的個人，以及道德可非難性有限的個人判處死刑。<sup>22</sup>」

---

Justice establishes clear provisions in the Guidelines for Execution of Death Penalty Cases, ensure that death penalties are not enforced for persons with psychosocial and/or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2021 年 10 月 21 日參閱)。

<sup>22</sup>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36 (2018) on article 6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on the right to life, “States parties must refrain from imposing the death penalty on individuals who face special barriers in defending themselves on an equal basis with others, such as persons whose serious psycho-social and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mpeded their effective defense, and on persons that have limited moral culpability. “

精神障礙不得判處死刑並非探討行為時之責任能力，而是探討量刑因素。本段意見表示，針對在訴訟上因為個人的特殊障礙情狀（例如存有嚴重社會心理和心智缺陷）而導致無法進行有效自我辯護之人，以及具有有限可責性的個人，不得判處死刑。其不得判處死刑之原因主要有二：(1)欠缺辯護能力；(2)降低道德可非難性。其說理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Atkins v. Virginia* 案<sup>23</sup>之解釋完全相同(詳後述)。

我國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4289 號](#) 判決表示：「且現階段刑事政策，非在實現以往應報主義之觀念；除應重視社會正義外，更應重視教化功能，期行為人能重新適應社會生活。除非犯罪情節最重大之罪，手段兇殘，罪無可逭，顯然無從教化矯正，否則不得科處死刑。尤以心理或智能障礙者對於刑罰之理解不足，實際上與未成年人無異，故聯合國在上開決議中將心智障礙者與未成年人等同視之，禁止締約國對其判處或執行死刑。況立法者既未就殺人罪之法定刑，定為唯一死刑，並將無期徒刑列為選科之項目，其目的即在賦予審判者能就個案情狀，審慎斟酌，俾使尚有教化遷善可能者或心智障礙者保留一線生機。」[104 年度台上字第 2268 號](#) 判決亦認為：「抑且我國刑法第 63 條並明文規定未滿 18 歲人犯罪者，不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是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欠缺者對於刑罰之理解不足，實際上與未成年人無異，自應亦本於相同意旨，審慎斟酌，俾符上開公政公約之精神。」均認為精神障礙者不得判處死刑之實質理由是對於刑罰之理解不足，影響其罪責，與上開人權事務委員會之意見並無二致。

人權事務委員會雖然表示：對於有嚴重社會心理和心智障礙已經影響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自我辯護的個人，法院不得對之科處死刑，但對「嚴重社會心理和心智障礙」的具體標準並無更仔細的說明。因此，更細緻的規範有待各國政府(包括法院)依本身國情來決定並落實。我國經常參考之先進國家立法例中，美國及日本同屬於參加公政

---

<sup>23</sup> 536 U.S. 304 (2002).

公約並保留死刑制度之國家，因此本言詞辯論意旨書以下介紹該二國相關作法供最高法院參考。

## 二、美國法

### (一)死刑判決之要件

英美普通法(common law)依被告主觀犯意(Mens rea)區分為五種犯罪類別：特定意圖犯(specific intent)、故意犯(general intent)、有認識重大過失(recklessness)、刑事過失(criminal negligence)、無過失責任<sup>24</sup>(strict liability)。其中 specific intent 與我國意圖犯相似<sup>25</sup>，指行為人除故意為某項犯罪行為外，並符合法律特別明定之意圖，例如竊盜、詐欺等財產性犯罪，其構成要件包括「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屬於此類犯罪。general intent 指故意為某項犯罪行為，與我國故意犯相當，包括我國之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sup>26</sup>。

英美普通法殺人罪指有下列 4 種犯意之一(英美法稱為“malice aforethought”)且其行為產生他人死亡之結果：(1)有殺人意欲(intent to kill a human being)，(2)有重傷害意欲(intent to inflict grievous bodily injury on another)，(3)有認識之重大過失(reckless indifference to an unjustifiably high risk to human life)，(4)有犯重罪意欲(intent to commit a felony)。其中「有認識重大過失」(recklessness)介於我國重大過失及不確定故意之間，指對危險有認識，但並不期待犯罪結果發生的重大過失，其

---

<sup>24</sup> 例如與 14 歲以下少年為性行為。

<sup>25</sup> Specific intent 指行為人有法律特定的主觀要素，其範圍包括但不限於我國的意圖犯。

<sup>26</sup> William Wilson, Murder by Omission: Some Observations on A Mismatch between the General and Special Parts, 13 New Crim., L. R. 1, 11 (2010)“The meaning of intention in the English context approximates to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includes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intention or knowledge.” Michael H. Hoffheimer, Murder and Manslaughter in Mississippi: Unintentional Killing, 71 Miss. L.J. 35, 51, n. 41 (2001), “Both Soviet and German law take an indirect intention (dolus eventualis) to be sufficient to constitute intentional killing. The technical definition of indirect intention is that if the actor engages in life-endangering behavior, his killing is intentional if he ‘reconcile himself’ or ‘makes peace’ with the likelihood of death....”



處罰遠重於過失犯。例如行為人瞄準友人置於頭上的蘋果，自信槍法神準可擊中蘋果，結果擊斃友人，屬於「有認識重大過失」(recklessness)，構成“depraved heart murder”，依英美傳統普通法應構成殺人罪，依目前美國各州州法屬於二級殺人罪或三級殺人罪，而非過失致死罪。例如 2020 年美國 Minnesota 州發生 Derek Chauvin 等警察逮捕非裔嫌犯 George Floyd 時，George Floyd 已被壓制躺在地上面朝下，Derek Chauvin 仍以膝蓋壓制 George Floyd 脖子約 9 分鐘，導致 George Floyd 死亡，歐、美多地因此發生種族示威抗議及暴動，Derek Chauvin 當時雖沒有殺人故意，仍分別因重罪殺人(二級殺人)、有認識重大過失殺人(depraved heart murder，三級殺人)等罪被地方法院判處有罪<sup>27</sup>，目前被告提起上訴中。

美國法曹協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於 1962 年完成編纂、出版之模範刑法典則將「故意」之「知」(knowingly)與「欲」(purposely)分為二構成要件要素，分開規定，其中「知」包括「明知」及「推定知悉」(inferred knowledge, constructive knowledge)<sup>28</sup>。美國聯邦及各州有採普通法者，有採模範刑法典模式者，有混合兼採者，並有一級殺人、二級殺人之區別，有的州法甚至將殺人罪分為三級(例如前述 Minnesota 州)，但不論採那一種立法模式，縱火致人死亡通常都列為最嚴重的一級殺人罪，得判處死刑。美國聯邦法採普通法立法模式，聯邦法 18 U.S.C. § 1111 即規定縱火致人死亡屬於一級殺

---

<sup>27</sup> Wikipedia, Derek Chauvi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rek\\_Chauvin#cite\\_note-McCaskill-2](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rek_Chauvin#cite_note-McCaskill-2) (2021 年 10 月 23 日參閱)。

<sup>28</sup> Model Penal Code, Sec. 2.02. “ (2) (b) Knowingly. A person acts knowingly with respect to a material element of an offense when:  
(i) if the element involves the nature of his conduct or the attendant circumstances, he is aware that his conduct is of that nature or that such circumstances exist; and  
(ii) if the element involves a result of his conduct, he is aware that it is practically certain that his conduct will cause such a result.

.....

(7) Requirement of Knowledge Satisfied by Knowledge of High Probability. When knowledge of the existence of a particular fact is an element of an offense, such knowledge is established if a person is aware of a high probability of its existence, unless he actually believes that it does not exist.”

人，應處死刑或無期徒刑<sup>29</sup>。

美國於 1992 年批准公政公約，但仍保留死刑制度。聯邦最高法院在 *Robert v. Louisiana* 案<sup>30</sup>表示：法定刑若為唯一死刑，而無其他選項，陪審團裁量是否科處被告死刑時，將無法考量個案之特別情狀，應屬違憲。聯邦最高法院並在 *Furman v. Georgia* 案<sup>31</sup>要求聯邦及各州政府對於科處死刑應設明確準則，不得恣意；聯邦及各州政府因此均制定科處死刑之相關法律規範。

美國聯邦政府 1994 年制訂 *The Federal Death Penalty Act*，其中 18 U.S. Code § 3592 條列舉法院在決定是否對被告處以死刑時，應考量之減輕與加重因素。「減輕刑罰因素」有下列八項：(1)被告認知能力之減弱，(2)被告受到脅迫，(3)被告參與程度較低，(4)其他同等可責之被告並未被判處死刑，(5)被告無重要之前科，(6)被告犯罪時是處於心智或情緒上之嚴重干擾，(7)被害人對於導致其死亡之犯罪行為有表示同意，(8)其他因素（被告之成長背景、紀錄或性格，或該犯行之其他足以避免判死之情況）<sup>32</sup>。

---

<sup>29</sup> 18 U.S.C. § 1111, “(a) Murder is the unlawful killing of a human being with malice aforethought.

Every murder perpetrated by poison, lying in wait, or any other kind of willful, deliberate, malicious, and premeditated killing; or committed in the perpetration of, or attempt to perpetrate, any arson, escape, murder, kidnapping, treason, espionage, sabotage, aggravated sexual abuse or sexual abuse, child abuse, burglary, or robbery; or perpetrated as part of a pattern or practice of assault or torture against a child or children; or perpetrated from a premeditated design unlawfully and maliciously to effect the death of any human being other than him who is killed, is murder in the first degree. Any other murder is murder in the second degree. (b) Within the special maritime and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hoever is guilty of murder in the first degree shall be punished by death or by imprisonment for life”.

<sup>30</sup> 428 U.S. 325 (1976).

<sup>31</sup> 408 U.S. 238 (1972).

<sup>32</sup> 18 U.S.C. § 3592, “(a) Mitigating Factors.—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sentence of death is to be imposed on a defendant, the finder of fact shall consider any mitigating factor,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1) Impaired capacity.—

The defendant’s capacity to appreciate the wrongfulness of the defendant’s conduct or to conform conduc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law was significantly impaired,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capacity was so impaired as to constitute a defense to the charge.

(2) Duress.—

The defendant was under unusual and substantial dures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duress was of such a degree as to constitute a defense to the charge.

(3) Minor participation.—

The defendant is punishable as a principal in the offense, which was committed by another, but the defendant’s participation was relatively minor,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participation was so



所謂「加重刑罰因素」，指本案具有某些特別嚴重的犯罪情節或被告個人因素，被立法者認為有較其他相同犯罪更為嚴重之情況。個案至少必須具有一項加重因素，才能被判處死刑。殺人罪(如前解釋，縱火致人死亡屬於最嚴重的一級殺人罪)的加重因素有下列 16 項：(1) 在實行或企圖實行下列各罪時，或犯後立即逃逸時，發生死亡或傷害致死情形（該項條文列舉二十多種聯邦犯罪），(2)有涉及槍砲彈藥的暴力重罪之前科，(3)曾犯得處以死刑或終身監禁之致他人死亡之罪而經定罪者，(4)有其他嚴重犯行之前科紀錄，(5)其犯行對第三人產生嚴重生命危險，(6)邪惡、殘酷的實施方式，(7)因本件犯行給付金錢報酬，(8)因本件犯行收受財產上利益，(9)事先策劃，(10)有二次以上判處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毒品交易罪定罪紀錄，(11)被害人因老幼羸弱有易受傷害性，(12)有重大聯邦毒品罪定罪紀錄，(13)行為人於參與毒品組織販毒給未滿 21 歲之人時犯本件罪行，(14)被害對象是政府高階公務員，(15)有性侵害或猥褻孩童之定罪紀錄，(16)殺死數人或企圖殺死數人<sup>33</sup>。

---

minor as to constitute a defense to the charge.

(4)Equally culpable defendants.—

Another defendant or defendants, equally culpable in the crime, will not be punished by death.

(5)No prior criminal record.—

The defendant did not have a significant prior history of other criminal conduct.

(6)Disturbance.—

The defendant committed the offense under severe mental or emotional disturbance.

(7)Victim's consent.—

The victim consented to the criminal conduct that resulted in the victim's death.

(8)Other factors.—

Other factors in the defendant's background, record, or character or any other circumstance of the offense that mitigate against imposition of the death sentence.”

<sup>33</sup> 18 U.S.C. § 3592(c) “Aggravating Factors for Homicide.—In determining whether a sentence of death is justified for an offense described in section 3591(a)(2), the jury, or if there is no jury, the court, shall consider each of the following aggravating factors for which notice has been given and determine which, if any, exist:

(1)Death during commission of another crime.—...

(2)Previous conviction of violent felony involving firearm.—....

(3)Previous conviction of offense for which a sentence of death or life imprisonment was authorized.—...

(4)Previous conviction of other serious offenses.—...

(5)Grave risk of death to additional persons.—

The defendant, in the commission of the offense, or in escaping apprehension for the violation of the offense, knowingly created a grave risk of death to 1 or more persons in addition to the victim of the offense.

如果個案同時存在「加重刑罰因素」、「減輕刑罰因素」，則陪審團必須衡量，當陪審團決定「加重刑罰因素」之比重超越「減輕刑罰因素」，且陪審團對於死刑之決定有一致決，才可判處死刑<sup>34</sup>。美國青少年犯以及精神喪失固然屬於不得宣告死刑的獨立事由，「教化可能性」則非不得宣告死刑的獨立事由，亦非對青少年犯得否宣告「不准假釋之無期徒刑」(life without parole)之獨立事由<sup>35</sup>。

最高法院院長吳燦於擔任最高法院庭長時曾發表文章表示：在英美法上，行為人僅基於間接故意犯罪影響行為人責任及量刑，間接故意殺人並非「情節最重大之罪」，不應判處死刑<sup>36</sup>；「美國法規定，判處死刑，必須具備特定之加重條件；反之，如具備特定之減輕條件，則不得判處死刑。」「有教化可能性」屬於美國死刑減輕條件，對無教化可能性之被告才能判處死刑<sup>37</sup>。可能均係出於吳院長對英美法及美國法之誤解<sup>38</sup>。

---

(6)Heinous, cruel, or depraved manner of committing offense.—...

(7)Procurement of offense by payment.—...

(8)Pecuniary gain.—...

(9)Substantial planning and premeditation.—...

(10)Conviction for two felony drug offenses.—...

(11)Vulnerability of victim.—...

(12)Conviction for serious federal drug offenses.—...

(13)Continuing criminal enterprise involving drug sales to minors.—...

(14)High public officials...

(15)Prior conviction of sexual assault or child molestation.—...

(16)Multiple killings or attempted killings.—

The defendant intentionally killed or attempted to kill more than one person in a single criminal episode.”

34 18 U.S.C. § 3593, “(e)Return of a Finding Concerning a Sentence of Death. If, in the case of—(2)an offense described in section 3591(a)(2), an aggravating factor required to be considered under section 3592(c) is found to exist; ...the jury, or if there is no jury, the court, shall consider whether all the aggravating factor or factors found to exist sufficiently outweigh all the mitigating factor or factors found to exist to justify a sentence of death, or, in the absence of a mitigating factor, whether the aggravating factor or factors alone are sufficient to justify a sentence of death. Based upon this consideration, the jury by unanimous vote, or if there is no jury, the court, shall recommend whether the defendant should be sentenced to death, to life imprisonment without possibility of release or some other lesser sentence.”

35 Jones v. Mississippi, 141 S. Ct. 1307 (2021).

36 吳燦，「教化可能性」於死刑案件量刑之定位，檢察新論，23期，2018年2月，15頁以下，17頁。

37 吳燦，「教化可能性」於死刑案件量刑之定位，檢察新論，23期，2018年2月，15頁以下，19頁。

38 對上開英美法提出不同看法並對吳燦院長見解提出批評，請參見吳巡龍，間接故意殺人罪判

## (二) 精神障礙對死刑之影響

如前(貳、一)所述，美國審判程序對有精神疾病之被告係採送精神醫院或處所治療、於治療完畢後再進行量刑程序之方式處理。就精神障礙而無法治療者，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係於 *Atkins v. Virginia* 案<sup>39</sup>決定該種情況對死刑之影響。該案被告 Atkins 與另一名共犯涉嫌擄走被害人 Eric Nesbitt，強盜被害人身上現金，將被害人載去提款機提款，再把被害人帶到偏僻處，開 8 槍將其殺害。被告 Atkins 審判前接受心智檢測，發現其智商只有 59，事實審判決 Atkins 死刑。本案上訴至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聯邦最高法院表示：對精神障礙者不得判處死刑，否則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8 條禁止量刑過苛條款，主要基於兩個因素，第一，行為人之判斷事理能力及衝動控制能力不足，降低其道德可非難性；第二，行為人辯護能力不足，減損死刑判決程序之可信賴性及公正性<sup>40</sup>。該案被告 Atkins 智商只有 59，因此撤銷該死刑判決。

在 *Hall v. Florida* 案<sup>41</sup>，被告 Hall 與另一位共犯一起綁架一位新婚且懷孕之女子，對之強制性交後殺害；隨後不久，該 2 位被告又計畫強盜某便利商店，並在該商店停車場殺死一名試圖逮捕他們之警員。事實審判處被告 Hall 二個死刑，該州(佛羅里達州)州法以智

---

處死刑是否違反公政公約，月旦裁判時報，113 期，2021 年 11 月，57 頁以下，61-63 頁。

<sup>39</sup> 536 U.S. 304 (2002).

<sup>40</sup> 536 U.S. 304, 306-307 (2002), "Those mentally retarded persons who meet the law's requirements fo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should be tried and punished when they commit crimes. Because of their disabilities in areas of reasoning, judgment, and control of their impulses, however, they do not act with the level of moral culpability that characterizes the most serious adult criminal conduct. Moreover, their impairments can jeopardize the reliability and fairness of capital proceedings against mentally retarded defendants. Presumably for these reasons, in the 13 years since we decided *Penry v. Lynaugh*, 492 U.S. 302, 106 L. Ed. 2d 256, 109 S. Ct. 2934 (1989), the American public, legislators, scholars, and judges have deliberated over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death penalty should ever be imposed on a mentally retarded criminal. The consensus reflected in those deliberations informs our answer to the question presented by this case: whether such executions are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 prohibited by the Eighth Amendment to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sup>41</sup> 572 U.S. 701 (2014).

商檢測來判斷智能障礙程度是否達可判處死刑之標準，若智商超過 70，即屬於可判決死刑之對象。被告 Hall 提出其智商檢測為 71 之檢測報告，主張不得判處死刑，經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駁回其上訴。本案上訴至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聯邦最高法院表示：智商檢測有其誤差範圍，佛羅里達州以智商檢測作為智能障礙是否達可判處死刑程度之絕對標準，忽略其他被告心智障礙程度之證據，該判決違反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8 條禁止量刑過苛條款，因此撤銷死刑判決。

綜上，依美國法，被告精神(智能)障礙達到嚴重降低其道德可非難性或辯護能力者，不得判處死刑；法院應綜合參考被告智商檢測及其他心智障礙程度之證據(例如與被告有實際接觸者之證詞)，對於智商檢測 70 以下之被告不判處死刑。法院綜合參考被告智商檢測及其他心智障礙證據後，若認為被告心智障礙影響辯護能力及道德可非難性之程度不足以動搖死刑判決者，則仍得科處死刑<sup>42</sup>。

依美國法，檢察官對被告犯罪事實固有舉證責任，被告若主張有阻卻違法、阻卻責任或減免罪責事由之「積極抗辯」，因為該等事由對被告有利，且被告對該事由有特殊知識，比較瞭解何處取得證據證明該事由，若使檢察官對此等事由負舉證責任，被告可能胡亂抗辯或故意隱匿證據以混淆真相，因此被告不僅負有「提出證據責任」，並負「說服責任」。被告說服責任舉證程度無庸至「無合理懷疑」程度，一般僅以「過半證據」為已足<sup>43</sup>，但也有以「明確證據」或「無合理懷疑」為心證門檻者。美國聯邦法 18 U.S.C. 17(b)即規定：「被告主張心神喪失應負明確證據之舉證責任。<sup>44</sup>」

---

<sup>42</sup> For example, *United States v. Montgomery*, 635 F.3d 1074 (2011, cert. denied).

<sup>43</sup> Stephen Michael Everhart, *Putting a Burden of Production on the defendant Before Admitting Evidence that Someone Else Committed the Crime Charged: Is It Constitutional?* 76 NEB. L. REV. 272, 289 (1997). *United States v. Deleveaux*, 205 F.3d 1292, 1298-99 (11<sup>th</sup> Cir. 2000) (holding defendant's assertion of an affirmative defense may require the defendant to prove the defense 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sup>44</sup> 18 U.S. Code § 17, "(b)Burden of Proof.— The defendant has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e defense of insanity by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Patterson v. New York* 案<sup>45</sup>，對被告「積極抗辯」負說服責任提出較仔細解釋，該判決影響至今。該案被告 Patterson 婚後不久即與其妻感情不睦分居，嗣因認為其妻與前男友死灰復燃，持槍至其妻住所射殺其前男友，檢察官起訴被告犯二級謀殺罪，被告提出「積極抗辯」，主張當時他情緒極度失控，應僅構成過失致死罪(manslaughter)。依據紐約州州法，行為人因合理事由情緒極度失控而殺人<sup>46</sup>，僅構成過失致死罪(類似我國之義憤殺人罪)。紐約州州法要求被告提出「積極抗辯」時，對該抗辯事由為真實負有說服責任，其證明程度為過半心證門檻。州地方法院判處謀殺罪，被告不服提起上訴，上訴理由主張州法要求被告應就「情緒極度失控」一節負說服責任，違反聯邦憲法修正案第 14 條正當法律程序。州上訴法院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均維持州地方法院之判決。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本案表示：依英美普通法(common law)原則，被告提出「積極抗辯」時，包括欠缺違法性(justification)、欠缺有責性(excuse)及減輕罪責(alleviation)事由，應負證明責任<sup>47</sup>。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僅要求檢察官對法律明文規定之犯罪構成要件要素負舉證責任，證明至「無合理可疑」程度。被告主張行為時「情緒極度失控」，屬於減輕刑責之「積極抗辯」，憲法不要求檢察

---

45 432 U.S. 197, 202 (1977).

46 432 U.S. 197, 199 (1977) (quoting New York Penal Law § 125.20(2) [ McKinney 1975 ] ).

47 432 U.S. 197, 202 (1977) ("In determining whether New York's allocation to the defendant of proving the mitigating circumstances of severe emotional disturbance is consistent with due process, it is therefore relevant to note that this defense is a considerably expanded version of the common-law defense of heat of passion on sudden provocation and that at common law the burden of proving the latter, as well as other affirmative defenses -- indeed, "all... circumstances of justification, excuse or alleviation" -- rested on the defendant. 4 W.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201; M. Foster, Crown Law 255 (1762); Mullaney v. Wilbur, supra, at 693-694. This was the rule when the Fifth Amendment was adopted, and it was the American rule when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was ratified.").該判決並表示：早於 *Leland v. Oregon* 案 343 U.S. 790 (1952) 及 *Rivera v. Delaware* 案 429 U.S. 877 (1976)，聯邦最高法院就表示：州法可對主張行為時心智喪失的被告要求其負舉證責任，Oregon 州法甚至規定被告舉證責任的心證門檻達無合理懷疑程度，而 Delaware 州法規定被告的舉證責任心證門檻為過半程度，該 2 案分別被聯邦最高法院宣告合憲。

官證明減輕事由之不存在，州法為避免刑事程序過度無效率、昂貴及造成結果不正義，要求被告對此負舉證責任，心證門檻為過半程度，與憲法正當法律程序無違<sup>48</sup>。

依美國聯邦法 18 U.S. Code § 3593 (c)，死刑加重因素的舉證責任在於檢方，證明程度是「無任何合理懷疑」；死刑減輕因素的舉證責任在於被告，證明程度則是「優勢證據」（過半證據）<sup>49</sup>。

若判處死刑後執行前發現受刑人有精神障礙，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1986 年在 Ford v. Wainwright 案<sup>50</sup>表示：心神喪失者不得執行死刑。並於 2007 年在 Panetti v. Quarterman 案<sup>51</sup>確立精神障礙不得執行死刑之具體標準，被告需能瞭解其被執行死刑之原因，才能對之執行死刑。

### 三、日本法

對於涉犯死刑之案件，在法院審理程序中，被告提出心神喪失之抗辯，包括程序上主張因心神喪失而無訴訟能力，以及實體面上主張被告於行為時處於心神喪失狀態之人，日本實務如何處理，以下簡介之：

#### (一) 審判時陷於心神喪失狀態，得為不受理判決

日本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日本刑訴法) 第 314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被告心神喪失者，經聽取檢察官及辯護人意見，應裁定於狀態

---

<sup>48</sup> 432 U.S. 197, 209-210. (“To recognize at all a mitigating circumstance does not require the State to prove its nonexistence in each case in which the fact is put in issue, if in its judgment this would be too cumbersome, too expensive, and too inaccurate.... We therefore will not disturb the balance struck in previous cases holding that the Due Process Clause requires the prosecution to prov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ll of the elements included in the definition of the offense of which the defendant is charged. Proof of the non-existence of all affirmative defenses has never been constitutionally required; and we perceive no reason to fashion such a rule in this case and apply it to the statutory defense at issue here.”).

<sup>49</sup> 18 U.S. Code § 3593 (c), “...The burden of establishing the existence of any aggravating factor is on the government, and is not satisfied unless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factor is established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burden of establishing the existence of any mitigating factor is on the defendant, and is not satisfied unless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factor is established 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information.”

<sup>50</sup> 477 U.S. 399 (1986).

<sup>51</sup> 551 U.S. 930 (2007).

持續間停止審判程序<sup>52</sup>。」欠缺訴訟能力之心神喪失，係指辨別重要利害並依此辨別為相當防禦能力有所欠缺<sup>53</sup>。如被告為重度聽覺障礙、未習得言語能力之二次精神遲滯，於精神能力或意思疏通能力有嚴重障礙，但透過手語之通譯，仍能正確理解自己在刑事程序置於何種立場，得為自己利益之防禦為相當的確之判斷，不能認定為審判時為心神喪失，而無訴訟能力<sup>54</sup>。

由於日本刑訴法第 314 條第 1 項並未規定何時為持續狀態之終止，為避免案件一直懸而未決，依最高裁判所第一小法廷平成 28 年(2016 年)12 月 19 日判決<sup>55</sup>，如審判中被告心神喪失，檢察官亦無意撤回起訴，而刑訴法亦無訴訟中止之明文，鑑於訴訟能力因嗣後失去之回復可能性的判斷，此際得準用刑訴法第 338 條第 4 款為公訴不受理判決。

該案略以：被告於平成 7 年(1995 年)5 月 3 日在愛知縣豐田市内之神社境內，以殺人之犯意持多功能菜刀(文化包丁<sup>ぶんかぼうちょう</sup>)刺殺當時 66 歲之男性及其 1 歲之孫子，經以殺人罪起訴後，辯護人以其精神病惡化為由聲請停止審判，平成 9 年(1997 年)3 月 28 日經一審法院認定被告處於心神喪失狀態，依刑訴法第 314 條第 1 項，停止訴訟程序，另使被告入醫院就醫。停止訴訟程序 17 年後，第一審法院於平成 26 年(2014 年)3 月 20 日以被告有不可逆的慢性化統合失調症，因腦萎縮導致認知機能嚴重障害而欠缺訴訟能力，亦無回復之可預見性為由，準用刑訴法第 338 條第 4 款為公訴不受理之判決。惟二審認一審解釋

---

52 原文是：第 314 條①「被告人が心神喪失の状態に在るときは、檢察官及び弁護人の意見を聴き、決定で、その状態の続いている間公判手続を停止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但し、無罪、免訴、刑の免除又は公訴棄却の裁判をすべきことが明らかな場合には、被告人の出頭を待たないで、直ちにその裁判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引自電子政府の総合窓口(e-Gov)，刑事訴訟法，<https://reurl.cc/Dvz7Z5> (最後瀏覽：2021 年 10 月 26 日)。

53 最決平 7・2・28 刑集 49 卷 2 号 481 頁，<https://reurl.cc/pxYmAa>(最後瀏覽：2021 年 10 月 19 日)。

54 最判平 10・3・12 刑集 52 卷 2 号 17 頁，<https://reurl.cc/95347d>(最後瀏覽：2021 年 10 月 19 日)。

55 最判平 28・12・19 刑集第 70 卷 8 号 865 頁，判決要旨：因被告無訴訟能力而停止訴訟程序後，顯無可預見被告得回復訴訟能力而有再開審判程序之可能，法院得準用刑訴法第 338 條第 4 款為公訴不受理之判決。參照：<https://reurl.cc/kVIWDL> (最後瀏覽：2021 年 10 月 19 日)，全文參照：<https://reurl.cc/R6voGZ>(最後瀏覽：2021 年 10 月 19 日)。

適用刑訴法第 338 條第 4 款有誤，不採一審判決之見解，經上訴三審，最高裁判所自為判決，認一審以被告有不可逆的慢性化統合失調症，因腦萎縮導致認知機能嚴重障害而欠缺訴訟能力，亦無回復之可預見性，而處於心神喪失狀態，依日本刑訴法 314 條第 1 項停止審判程序後，再經判斷無可預見被告得回復訴訟能力，有再開審判程序之可能，且該訴訟僅於形式上繫屬於法院，於其停止審判程序的現狀，檢察官亦無意撤回起訴，刑訴法亦無訴訟中止之明文，鑑於訴訟能力因嗣後失去之回復可能性的判斷<sup>56</sup>，此際得準用刑訴法第 338 條第 4 款為公訴不受理判決。

## (二)審判時於實體面主張行為時處於心神喪失狀態

死刑為日本刑法第 9 條所規範之刑罰種類之一，日本刑法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心神喪失者之行為，不罰。」則行為時非自陷於心神喪失而涉犯得科處死刑之犯行，法院應不得為死刑之判決。如所犯之罪為殺人、傷害、放火、強盜、強制性交等、強制猥褻等 6 種類之罪，經以心神喪失、精神耗弱為不起訴處分、以心神喪失為由而判決無罪、以精神耗弱為由減輕其刑者之確定判決，應依醫療觀察法處遇之<sup>57</sup>。

---

56 該案池上政幸裁判長之補足意見更說明，以被告訴訟能力欠缺而無回復之可預見性之上揭不受理判決，關於訴訟能力之回復可能性的判斷，應聽取醫師等專業人員之意見，並以經過一定時間之觀察為必要。同前註 55 參照。

57 心神喪失等の状態で重大な他害行為を行った者の医療及び観察等に関する法律（平成 15 年法律第 110 号，通稱醫療觀察法）第 33 条：「①檢察官は、被疑者が対象行為を行ったこと及び心神喪失者若しくは心神耗弱者であることを認めて公訴を提起しない処分をしたとき、又は第二条第二項第二号に規定する確定裁判があったときは、当該処分をされ、又は当該確定裁判を受けた対象者について、対象行為を行った際の精神障害を改善し、これに伴って同様の行為を行うことなく、社会に復帰することを促進するためにこの法律による医療を受けさせる必要が明らかでないことを認め、地方裁判所に対し、第四十二条第一項の決定をすることを申し立て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ただし、当該対象者について刑事事件若しくは少年の保護事件の処理又は外国人の退去強制に関する法令の規定による手続が行われている場合は、当該手続が終了するまで、申し立てをしないことができる。

②前項本文の規定にかかわらず、檢察官は、当該対象者が刑若しくは保護処分の執行のため刑務所、少年刑務所、拘置所若しくは少年院に収容されており引き続き収容されることとなる時、又は新たに収容される時は、同項の申し立て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当該対象者が外国人であつて出国したときも、同様とする。



心神喪失係指無辨識事物之理非善惡能力，或無依其辨識而行動之能力的一種精神障害<sup>58</sup>，即行為人犯行當時無法意識行為之違法性，依此精神狀態所為之行為而認定為無能力者<sup>59</sup>。關於無法「意識」之認定，以行為人是否有辨識行為之是非善惡能力及依其辨識之行動能力有無顯著減退<sup>60</sup>為標準。就心神喪失之法律上判斷，法院應著重生物學、心理學之要素<sup>61</sup>，判斷其精神障害之有無、程度，對犯行之影響，更應考慮其犯行之動機(及其理解之可能性)、犯行之計畫性、犯行之態樣(及其異常性)、犯後之行動(有無湮滅罪證、違法性意識、表現於外之反省表情等)、對犯行記憶之有無、程度、病前之性格、行動(犯行之前是否有經營其社會生活)、犯罪傾向及其關聯性，再以

---

③ 檢察官は、刑法第二百四条に規定する行為を行った対象者については、傷害が軽い場合であつて、当該行為の内容、当該対象者による過去の他害行為の有無及び内容並びに当該対象者の現在の病状、性格及び生活環境を考慮し、その必要がないと認めるときは、第一項の申立てをしないことができる。ただし、他の対象行為をも行った者については、この限りでない。」  
第2条 「①この法律において「対象行為」とは、次の各号に掲げるいずれかの行為に当たるものをいう。

一 刑法(明治四十年法律第四十五号)第百八条から第百十条まで又は第百十二条に規定する行為

二 刑法第百七十六条から第百八十条までに規定する行為

三 刑法第百九十九条、第二百二条又は第二百三条に規定する行為

四 刑法第二百四条に規定する行為

五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三十八条又は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二百三十六条又は第二百三十八条に係るものに限る。)に規定する行為

② この法律において「対象者」とは、次の各号のいずれかに該当する者をいう。

一 公訴を提起しない処分において、対象行為を行ったこと及び刑法第三十九条第一項に規定する者(以下「心神喪失者」という。)又は同条第二項に規定する者(以下「心神耗弱者」という。)であることが認められた者

二 対象行為について、刑法第三十九条第一項の規定により無罪の確定裁判を受けた者又は同条第二項の規定により刑を減輕する旨の確定裁判(懲役又は禁錮の刑を言い渡し、その刑の全部の執行猶予の言渡しをしない裁判であつて、執行すべき刑期があるものを除く。)を受けた者...

引自電子政府の総合窓口(e-Gov)，心神喪失等の状態で重大な他害行為を行った者の医療及び観察等に関する法律，<https://reurl.cc/oxYgr5> (最後瀏覽：2021年10月26日)。

58 大判昭6・12・3 刑集10巻628頁，LEX/DB 27931519。

59 最決昭29・7・30 刑集8巻7号1231頁，<https://reurl.cc/EZ1YLk>(最後瀏覽：2021年10月18日)。

60 最判昭53・3・24 刑集32巻2号408頁，<https://reurl.cc/Q6Zm72>(最後瀏覽：2021年10月18日)。

61 最判昭58・9・13 集刑第232号95頁，<https://reurl.cc/MkjQqL>(最後瀏覽：2021年10月18日)。

規範之立場加以評價<sup>62</sup>。因施用安非他命而犯罪，<sup>63</sup>如處得科處死刑之殺人罪，是否得科處死刑，以下實例可供參酌。

發生在 2012 年 6 月 10 日下午 1 時許，當時 36 歲之男子，大阪府大阪市中央区東心齋橋路上，持菜刀襲擊路人，進而殺死 2 名路人，經檢察官以殺人罪起訴之「心齋橋通り魔殺人事件」，裁判員判決死刑，二審改以被告受安非他命中毒後遺症影響，改量處無期徒刑，並經最高裁判所維持。

一審判決不採辯護人主張被告有精神障害(安非他命中毒後遺症)而行為時心神耗弱的見解，認定被告有完全責任能力，被告在工作場所常有不安感，犯行前夜聽從「刺下去」之幻聽，犯行當日抵達現場，將菜刀置放背包內之旁人難以見到、自己易於取出的有利犯行之處，覓得被害人 H 後，朝其腹部、頭部等對生命有所危害之部位刺上數刀，嗣追趕其他行人，對逃跑較慢之 I 的背部與頭部刺上數刀，警察到場後，依照警察指示不進行抵抗，對警察之詢問有道歉反省之語亦為合乎常情之應答，鑑定得知被告係本對衝突之忍耐性極低，對於包含暴力之攻擊性發現的臨界點極低的人格偏差，其犯行與其人格特質的無異質性，故認被告犯行時有判斷善惡之能力、控制自己行動之能力，安非他命中毒後遺症、幻聽、服藥中斷、犯行之前的失眠、不安等並

---

62 大山隆司、齋藤正人，心神喪失・心神耗弱，收錄於龍岡資晃編，現代裁判法大系(30)刑法・刑事訴訟法，新日本法規，2000 年 1 月，209 頁。

63 實務上多不認為得免除其責任能力，有以下實例：

- (1) 食用有睡眠作用之含有氟硝西洋、溴西洋的蛋糕，在藥物之作用下，盜取陷於昏醉狀態之被害人的 15 萬日圓，被告主張其行為時係因多種人格障礙之影響，以其第二人格盜取現金，故無責任能力云云。東京高等裁判所平成 30 年 7 月 10 日判決認為，被告經鑑定確有多重人格障害，而對罹患多重人格障害之人，其特定的行為時點是否有事理辨識能力、行動制御能力的判斷，應綜合考量其該當犯罪行為之際人格性質、特徵，行為前後之言詞動作等。本案被告在第 2 人格之影響下，知悉自己需要金錢，使第 2 人格出現，對於是否做出違法行為，有避開之能力，卻順應之而取得金錢，做出違法行為，不應認為其(第二人閣下的該犯行有)事理辨識能力、行動制御能力欠缺而顯著低下之情，而無責任能力。參見東京高裁平 30・7・10 判決，LEX/DB 25565568。
- (2) 因為施用安非他命而患有安非他命精神病，處於生有幻覺、妄想狀態下，犯下施用安非他命犯行，不能認為無完全責任能力，蓋行為人對於欠缺施用安非他命之正當理由、動機有所認識。參見大阪地判平 11・1・12 判決，LEX/DB 28055164。

未顯著地使其喪失該能力，反而一定程度加強了被告犯行之決意<sup>64</sup>。

二審判決肯認被告行為時確有完全責任能力，以被告殺人之計畫性低，受有精神障害之影響而改判無期徒刑。其理由係從最高裁判所之相關判決<sup>65</sup>就殺害 2 人之無計畫性殺人案件，於量處死刑時，需考慮犯行及犯後罪證隱滅行為等，被告對生命輕視之態度、無人性之有計畫犯行，其程度甚為顯著，使得選擇死刑，考諸本案被告在犯行前 10 分鐘才購入菜刀，且該時點並未確定其殺人之犯意，顯無殺人計畫，犯行後警察到場，經警叱以「不要再做了」，而回以「抱歉」等情，確有反省之情，故其對於生命輕視之態度並不顯著等<sup>66</sup>。

最高裁判所第一小法廷令和元年 12 月 2 日駁回上訴之判決，維持二審判決將死刑改判無期徒刑的見解，即認量處死刑時應考慮被告犯行時確有受安非他命中毒症之影響，犯行前 10 分鐘才購入菜刀，且該時點並未確定其殺人之犯意，其無差別殺人並無特別之計畫，警察到場叱責即終止犯行，不抵抗而遵循指示被逮捕，有悔悟反省之態度，係衝動為之，對於生命輕視之態度並不顯著<sup>67</sup>。

總之，施用安非他命生有幻覺而殺人，仍有完全責任能力，量刑上如認定確係受幻覺所影響，而無特別殺人計畫係衝動為之，於現場確有悔悟反省，並無顯著輕視生命，不應為死刑判決。

### (三)判處死刑後陷於心神喪失狀態，得免除刑之執行

日本刑訴法第 479 條第 1 項規定，受死刑宣告之人如在心神喪失中，由法務大臣命令停止執行<sup>68</sup>。其適用實例為著名的「袴田事件」，

64 大阪地方裁判所平成 27 年 6 月 26 日判決，<https://reurl.cc/V50O7y>(最後瀏覽：2021 年 10 月 26 日)。

65 包括最高裁第一小法廷平成 24 年 2 月 20 日判決・裁判集刑 307 号 155 頁，同第三小法廷平成 24 年 7 月 24 日判決・同 308 号 159 頁，同第一小法廷平成 25 年 11 月 25 日判決・同 312 号 73 頁。

66 大阪高等裁判所平成 29 年 3 月 9 日判決，<https://reurl.cc/Gb5ygG>(最後瀏覽：2021 年 10 月 26 日)。

67 最判令 1・12・2 集刑第 327 号 17 頁，<https://reurl.cc/EZg0Yy>(最後瀏覽：2021 年 10 月 26 日)。

68 原文是：第 479 条①「死刑の言渡を受けた者が心神喪失の状態に在るときは、法務大臣の命令によつて執行を停止する。」引自電子政府の総合窓口 (e-Gov)，刑事訴訟法，

袴田巖在昭和 41 年(1966 年)涉犯強盜殺人罪嫌經起訴，昭和 55 年(1980 年)12 月 12 日死刑判決確定，即關押在監獄之中，屢為再審聲請經遭駁回，法務大臣亦不簽署死刑執行命令，平成 23 年(2011 年 2 月 11 日)法務大臣千葉景子依鑑定結果，仍認無停止執行之必要性，直至平成 26 年(2014 年)3 月 27 日靜岡地方裁判所准許再審，始釋放之<sup>69</sup>。

#### 四、本署意見

「精神障礙不得判處/執行死刑」此一基準固然已為聯合國所屬機關及人權事務委員會所確立，人權事務委員會 2018 年第 124 屆會議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第 49 點前段並解釋精神障礙者不得判處死刑之原因有二：(1)欠缺辯護能力；(2)降低道德可非難性。惟各國如何解釋及落實該基準，仍可能存在差異。

依美國法，被告精神(智能)障礙達到嚴重降低其道德可非難性或辯護能力者，且無法治癒者，不得判處死刑。法院應綜合參考被告智商檢測及其他心智障礙程度之證據，若認為被告心智障礙影響辯護能力及道德可非難性之程度不足以動搖影響死刑判決者，得科處死刑。依日本法，被告審判時主張係因藥物作用而影響其行為，經判斷有完全責任能力，可能影響是否量處死刑之判斷，但並非絕對不得判處死刑。

「精神障礙者不得判處死刑」此一法則既對我國產生內國法上之效力，仍應考慮上開法則與我國現有相關法制有無落差及如何調合。我國刑法第 57 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一、犯罪之動機、目的。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三、犯罪之手段。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

<https://reurl.cc/Dvz7Z5> (最後瀏覽：2021 年 10 月 26 日)。

<sup>69</sup> 參照ウィキペディア，袴田事件，<https://reurl.cc/zW5eOV>(最後瀏覽：2021 年 10 月 26 日)。

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精神障礙雖未明列為科刑因子，但應仍屬於科刑所應審酌之「一切情狀」。

就本案被告精神障礙程度方面，被告李國輝並無重大精神疾病，亦不曾因此方面疾病看診就醫。本案經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對被告為精神鑑定，雖認定：被告因施用安非他命類物質，因幻覺及妄想之作用下，產生憤怒之想法與情緒，之後做出縱火之行為，縱火行為與其精神疾病症狀之間具有一定之關聯性；但該鑑定報告指出：「李員在看守所中接受羈押，停止使用安非他命類物質大約於一個星期左右，其幻覺完全消失。」（臺大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第36頁，偵查卷二第366頁）。而依據該醫院鑑定心理衡鑑資料，「李員智力表現為中下程度，總智商（FIQ）=83，語文智商（VIQ）=79（邊緣程度），操作智商（PIQ）=89，應未達智能不足或邊緣智能之程度。」（精神鑑定報告書第2頁）

上開精神鑑定報告書並認為：(1)依據臨床標準，考量被告之個性、精神病理現象與涉案情境，被告在本案放火行為時，具有認知放火產生財物及人命傷害之能力，亦理解放火乃是錯誤之行為，具備辨識與放火相關事理之能力。(2)被告與聽幻覺之關係為「對抗」模式，依被告其他精神病理現象，亦從未出現被控制妄想或身體被動現象，從而，被告放火行為主要是一種對於症狀出於其個性之反應，而非認知行動完全受症狀主宰。根據臨床判斷，被告仍然具有在不同選項間進行選擇之一定程度之能力，雖因聽幻覺症狀與妄想之干擾頻率高與嚴重性大，造成被告於發病之後，經常處在情緒不佳的個性反應模式之中，增加其與他人之衝突頻率與嚴重度，則其對於聽幻覺症狀與妄想之情緒反應性也可能因此放大，可能造成其依事理辨識而選擇行為之能力下降，然因其反應模式仍為原有個性之反應模式，因此鑑定不傾向認定其依事理辨識而選擇行為之能力有顯著下降之情況。



就精神障礙降低被告道德可非難性方面，依原審臺灣高等法院 109 年度上重更二字第 5 號 判決事實認定：「被告在取得已加滿汽油之寶特瓶後走出加油站時有數次將寶特瓶旋緊，於同日凌晨 1 時 42 分許，返回本案房屋 4 樓走廊處，被告有將寶特瓶瓶蓋再次轉緊，並將寶特瓶倒置向下，測試寶特瓶是否已經旋緊，在觀察周遭有無遭人發現後，才將寶特瓶預藏在雜物塑膠箱內後離去，顯見被告能辨識所購買之汽油為危險性極高之易燃物，若溢出可能發生危險，才會有多次確認寶特瓶之瓶蓋是否鎖緊，且為免遭他人發覺，尚知觀察周遭環境有無人發現後才將該裝滿汽油之寶特瓶藏好，被告對外在環境有細密之觀察能力，並無神智異常之情。」(判決書第 18 頁)、「而被告於放火後，逃至新北市中和區和平街 76 巷內，並為規避警方查緝，隨手拿取路旁衣服變裝，顯然被告於放火後，清楚知悉其行為違法，不僅立即逃離現場，且能迅速變裝以規避警方查緝。從而，被告放火前後對於外界事物之認知、感受、反應及肢體運作協調能力均與常人無異。」(判決書第 19 頁)

就精神障礙影響被告辯護能力方面，原審認定：「被告於訊問時之法庭活動表現，觀諸被告各次於偵審筆錄之內容，可知被告於偵審中對於案發前後之行為順序、蘇福盛、陳永華、胡進福等人激怒其情緒之原因等犯罪之刺激及動機，暨其放火之細節，均能陳述明確且記憶清晰。其於原審審理過程中，針對敵性證人蘇福盛、陳永華所述，被告均能表示該等證人所述不實，而針對其他證人盧建宇、黃秀嬌、李群輝、蘇博文、吳秀鳳等人，則表示沒意見(見原審卷二第 26、28 至 30 頁)，於本院上訴審審理時亦能針對證人蘇福盛之證述明確表達意見(見 107 年度上重訴字第 24 號卷二第 100 頁)，是被告對於外在事理判斷及辨識之能力均屬正常。」(原審判決書第 19 頁)

綜上，本署認為被告李國輝並無因精神障礙而欠缺辯護能力或降低道德可非難性之情形，因此沒有精神障礙不得判處死刑之事由，原

判決應予維持。若鈞院認為被告李國輝受審時有無「因精神障礙而欠缺辯護能力或降低道德可非難性至影響死刑判決」之情形尚屬不明，則建議鈞院撤銷原判決，發回原審調查認定。

**肆、原判決論上訴人觸犯刑法第 173 條第 3 項、第 1 項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未遂罪，第 271 條第 1 項殺人計 9 罪，同條第 2 項、第 1 項殺人未遂計 5 罪，其認事用法是否有違法或不當之處？**

**一、偵查程序未指派通譯，並未違反公政公約規定**

辯護人稱被告係不通曉國語之緬甸華僑，偵查中卻多次出現檢察官或警察未指派通譯即進行訊問，違反公政公約第 14 條第 3 項第 1 款、第 6 款規定云云；先不論公政公約第 14 條第 3 項係規定「審判被控刑事罪時，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下列最低限度之保障」，同項第 1 款、第 6 款所定之通譯配置應僅限於法院審理，不包括偵查程序；況於本件偵查程序，因被告之中文聽說能力並無障礙，其於警詢或偵訊之自白均係出於任意性，有證據能力，原判決綜合事證業於第 4 頁詳細說明，可資參照。

**二、本件並無「累積因果關係」**

辯護人稱，原判決未審酌房東連秋香違法裝潢本案房屋出租，對於本件死亡結果具有累積因果關係，僅認定被告放火行為與死亡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有理由矛盾與不備之違法云云。按結果犯之成立，以行為與結果間具有因果關係為必要，欠缺時，行為人至多成立未遂，是因果關係之認定僅在於確定行為人應否對犯罪結果負責，與應論處之罪責及附隨之刑罰無關，數人如對結果均具有因果關係，其罪責與刑罰亦應各自判斷，無所謂平均負擔問題。又「累積因果關係」係指個別條件之存在雖均不足以獨自造成結果之

發生，惟當所有條件共同結合發生作用時，即足導致結果之發生，乃結果之發生是累積個別條件所成(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3578 號](#) 判決參照)。本件被告係以潑灑汽油引燃樓梯間雜物方式縱火，汽油乃危險性極高之易燃性液體，點燃即迅速四處燃燒，由第一審勘驗本案房屋現場及附近之監視器錄影紀錄顯示(地院卷二第 23、84 至 87 頁)，被告以打火機點燃後，該處旋即出現一圈明顯火光，瞬間發生大規模燃燒，進而延燒至各房間及產生濃煙，致附表一所示被害人或遭大火焚燒或因吸入過量廢氣死亡，是被告放火後所生之作用顯然持續至被害人死亡，係死亡結果不可想像其不存在之條件，並非單獨不足以造成結果發生而須結合其他條件始可，房東連秋香縱因違法裝潢本案房屋出租，致逃生不易，對死亡結果亦有因果關係，兩者亦非屬「累積因果關係」。

另判斷因果關係所重者係實際發生之事件流程與具體結果間之關係，嗣後結果可否因其他因素避免，在所不問，亦即假設因果對於實際發生之因果關係並無影響，且行為只要是造成結果共同條件之一，即具有因果關係<sup>70</sup>，是辯護人稱倘連秋香未違法裝潢出租，被告即使放火，亦不致於本件如此慘重傷亡等語，揆諸前揭說明，顯不足採。

### 三、被告對於本案被害人死亡結果具有客觀歸責

我國實務對於行為與結果間之因果關係，本採相當因果關係，亦即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具有相當之因果關係(最高法院 [76 年台上字第 192 號](#) 判例)；惟近年來實務似將客觀歸責導入相當因果關係中：「關於該相當性，得以

---

<sup>70</sup> 林鈺雄，新刑法總則，6 版 2 刷，2019 年 3 月，頁 158 以下。



審酌行為人是否有客觀可歸責性而為判斷，即行為人之行為倘對行為客體製造並實現法所不容許之風險時，該結果即應歸由行為人負責」(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118 號判決)。實則，因果關係與客觀歸責兩者之基準有別，前者乃原因與結果之經驗判斷，後者則屬規範評價，凡屬結果出現不可想像其不存在之條件，皆具有因果關係，例如放火案中，除點燃汽油者外，製造或販賣汽油者亦屬之，惟如此寬廣之範圍，不應全納入犯罪判斷，僅能擇其具刑法重要意義者，即犯罪結果倘能評價為某人之「工作物」(Werk)，則該人對犯罪結果即具有客觀歸責，是因果關係僅係客觀歸責之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sup>71</sup>。至於何種情形具有客觀歸責，Roxin 認為，若行為人對行為客體製造法所不容許的風險(Schaffung eines unerlaubten Risikos)、此不法風險在結果中實現(Verwirklichung des unerlaubten Risikos)及該結果在構成要件效力範圍內(Die Reichweite des Tatbestandes)始可<sup>72</sup>。

被告放火行為係判決附表一所示被害人死亡結果不可想像其不存在之條件，而在房屋內放火，顯然會對屋內人員造成傷亡風險，此風險繼續作用致 9 人死亡，而生命權之保護復屬於刑法第 271 條殺人罪之規範目的，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對於本件死亡結果具有客觀歸責無疑。

#### 四、被告對於陳永華、胡進福具有殺人之確定故意，對其餘被害人具有殺人之未必故意

辯護人稱，被告並無殺人故意，至多具有認識過失云云。按行為人對犯罪結果若具有客觀歸責，則尚須檢驗其主觀要件，兩者皆符合始具有構成要件該當性。本件被告遭起訴者係故意放火罪及故意殺人既未遂罪。故意係一種心理狀態，即行為人在認知所有客觀

<sup>71</sup> Roxin/Greco, Strafrecht AT Band I, 5 Aufl. §11 Rn.11

<sup>72</sup> Roxin/Greco, a.a.O., §11 Rn.53ff.

構成要件下，實現該犯罪之意欲(知與欲要素)，我國刑法第 13 條將故意區分為「確定故意」與「未必故意」兩種型態。故意之檢驗即係知與欲要素與客觀構成要件要素之對應關係，如彼此無法對應，則屬錯誤，惟此對應毋庸絲毫不差，僅需概略、大致即可<sup>73</sup>。

經查被告在臺灣高等法院更一審時自承：伊放火是針對陳永華，伊想要燒死的人是陳永華與蘇福盛，伊有看到陳永華進到房間，想要燒死陳永華等語(108 上重更一字第 2 號卷二第 87 至 89 頁)，而被告放火位置係在本案房屋 3 樓往 4 樓之室內梯平台，最靠近被害人胡進福居住之 407 室，本案房屋係集合式住宅，以非耐火材質木板等隔成房間出租，房間緊鄰，僅二側各有一逃生梯，被告縱火時間係晚上 8 點 32 分，當時正係屋內房客工作後休息之際，被告明知胡進福、陳永華與其他不相識之人在房間內，卻以潑灑汽油引燃樓梯間雜物方式放火，且於燃燒後迅速逃離現場，未對屋內人員示警或報警救災，將被告知與欲要素對應結果，被告本件放火係針對陳永華、胡進福，對該二人顯具有殺人之確定故意，至於其他不相識之房客，則具有縱因而燒死亦在所不惜之未必故意，原判決同此結論，洵屬正確，辯護人稱被告無殺人故意，與卷證有違，顯不足採。

### 五、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

被告基於放火燒死陳永華、胡進福之確定殺人故意及其他房客之殺人未必故意，而為放火行為，致原判決附表一之被害人胡進福等 9 人死亡，附表二之陳永華等 5 人因及時逃生始幸免於難，以及現有人住居之本案房屋雖有毀損但建築之主要結構體尚未喪失效用(依卷附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且如前所述，被告對附表一所示被害人死亡結果具有客觀歸責，對附表二之被害人

---

<sup>73</sup> 林鈺雄，新刑法總則，6 版 2 刷，2019 年 3 月，頁 199。

則已著手殺人，是被告以一行為犯刑法第 173 條第 3 項、第 1 項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第 271 條第 1 項殺人計 9 罪、同條第 2 項、第 1 項殺人未遂共 5 罪，依刑法第 55 條規定從一重之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殺人罪處斷，至被告放火行為雖亦燒燬本案屋內其他物品，此部分已包括在前揭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評價內，不另論罪，原判決同此結論，應屬可採。

## 伍、原判決量處上訴人死刑，量刑部分有無違法或不當之處？

### 一、量處死刑應審酌事項

德國刑法第 46 條規定量刑應以行為人罪責為基礎，並審酌刑罰對行為人未來社會生活之影響(第 1 項)；量刑時，對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處均應審酌，尤其行為人動機與目的、行為所顯露之思想、義務違反程度、犯行種類與所造成影響、行為人過往經歷、個人情狀與經濟狀態以及犯後表現，曾否力圖彌補損害及與被害人和解(第 2 項)；惟屬法定構成要件要素之情狀，則不得審酌(第 3 項)，是依德國量刑標準，應考慮再社會化。我國刑法第 57 條亦設有量刑基準，開宗明義即揭示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訂定 10 款審酌標準。惟我國與德國異，有死刑之設，法院如要量處死刑，因「現今刑罰個別處遇制度非只在滿足以往「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應報觀念，尤重在其「教育」功能，立法者既未將殺人罪之法定刑定為唯一死刑，而將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同列為選科之刑罰，其目的即在賦予審判者能就個案情狀，審慎酌定，俾使尚有教化遷善可能之犯罪行為人保留一線生機。故判決對於泯滅天良，窮凶惡極而予宣告死刑之案件，當應不厭其煩，除應於理由內就如何本於責任原則，依刑法第 57 條所定各款審酌情形，加以說明外，並須就犯罪行為人事後對於犯行是否猶未真誠坦白，無懊悔實據，確未能加以教化遷善，以及從主觀惡性與客觀犯行加以確切考量，何以必須剝奪其生

命權，使與社會永久隔離之情形，詳予敘明，以昭慎刑」（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873 號](#) 判決參照）。

另公政公約第 6 條第 2 項規定：「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the most serious crimes)，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故在量處死刑時應審酌是否屬「情節重大之罪」。

## 二、僅具未必故意之犯罪亦可能屬「情節重大之罪」

辯護人辯稱，被告至多僅具殺人未必故意，不屬於「情節最重大之罪」云云；誠然被告對除胡進福、陳永華具有殺人之確定故意外，對其餘被害人應僅具殺人之不確定故意；按公政公約第 6 條第 2 項條文只稱「情節最重大之罪」，無法僅從上開文字得知具體內容，法院適用時，應注意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之內容，不宜望文生義自行詮釋。人權事務委員會於 2018 年第 124 屆會議第 36 號一般性意見，就前揭公約第 6 條生命權有所詮釋，而第 35 段闡釋「情節最重大之罪」的意涵：「『情節最重大之罪』一詞必須作嚴格解讀，僅限於涉及故意殺人(intentional killing)的極嚴重罪行。在第 6 條的架構內，未直接和故意導致死亡的罪行(Crimes not resulting directly and intentionally in death)，如謀殺未遂、貪腐及其他經濟和政治罪行、武裝搶劫、海盜行為、綁架以及毒品和性犯罪儘管具有嚴重性質，但絕不能作為判處死刑的理由。從上開解釋可知，「情節最重大之罪」限於故意殺人之罪行，人權事務委員會並強調沒有造成死亡結果之犯罪不得判處死刑。其中“Intent”、“intentional”屬於英美普通法之專門法律術語，指故意犯(包括我國之意圖犯、直接故意犯與間接故意犯)。在上揭“Crimes not resulting directly and intentionally in death”，“intentionally”前面雖然有“directly”，但“directly”係修飾導致直接死亡結果的罪行，並非用來指涉「直接故

意」。日前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3266 號](#) 判決謂人權事務委員會本段解釋係指「情節最重大之罪」限基於「直接故意」犯殺人罪，並因此主張基於「間接故意」殺人之罪行，非「情節最重大之罪」，實屬誤會。準此，辯護人稱殺人未必故意不屬於情節最重大之罪，亦不足採。

### 三、原判決量刑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

原判決審酌被告犯罪情節，認為符合公政公約第 6 條所稱「犯情節最重大之罪」，且以被告責任為基礎，逐一審酌刑法第 57 條除第 8 款外之各款情事，並以臺大醫院鑑定報告為基礎，探討被告有無教化可能性，最後認定被告僅因憤恨不平，即預謀本件犯罪，手段兇殘冷血，毫無人性，除與被害人胡進福、陳永華有過節外，其餘被害人等均無冤仇，卻恣意剝奪彼等寶貴生命，堪認罪大惡極，無可寬典，實屬最殘酷嚴重之犯行，且以被告手段、情節、犯後態度等，均顯示難以教化，其他教育矯正刑亦不能導正其思想與行為，為維護社會秩序，確保民眾生命安全，乃量處被告死刑，並宣告褫奪公權終身，原判決實已就前揭說明所示應注意事項均審酌，並依最高法院判決要求逐一檢視刑法第 57 條各款情事，求被告生而不可得，量處死刑可謂至允至當。

此致

最高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8 日

檢察官 林永義  
陳瑞仁

蔡秋明

林俊言

李進榮

吳巡龍